

黄永玉： 人只要笑，就没有输

读书，打架，侃大山

黄永玉人生三大爱好依次是读书，打架，侃大山。过去腿脚还能跑的时候，他闲下来最爱骑个小摩托逛潘家园市场，往热闹人堆里扎。他喜欢买东西，可他不会讲价，整天兴高采烈地往家里搬一堆上当受骗的证据：虚高价的花瓶，缺一只眼睛的画眉鸟，名不副实的老字画。

来子是他的年轻朋友，到家里看望他，进屋一看都是陌生面孔，坐他家里喝茶、看画、侃大山，每人手里一根他的雪茄。热热闹闹招待了一下午，把人送走了才知道，全是下午在官园买鸟认识的路人。

“你认识他们？”“不认识。”“那他们来干嘛？”“好玩！”

后来摔倒受伤，聊天升级为一个老人最大的娱乐。高兴起来有时候说粤语，有时候说凤凰话，他还会说很流利的闽南语和从星期一到星期天的英语，这都是流浪时学会的语言技能。其它的语种他只会一两个单词，比如日语会说鸡蛋，因为讲笑话的时候用得上。

历史在他的讲述里变成一个个具体的笑话。齐白石招待客人的点心是放了多年的月饼，李可染练字把垫在下面的毯子都练出一个坑，毛主席纪念堂一进门壁画是他画的《祖国大地》，草稿是在废稿纸上画的。当时出了几个方案都不通过，最后找到黄永玉，黄永玉就随手捡了别人的稿纸，在背面画了大河山川，寓意“问苍

茫大地，谁主沉浮”。

他喜欢讲述家乡的故事，湘西的水、湖、山，还有表叔沈从文。小时候在老家只见过一面，流浪的时候没有联系，他刻木刻，表叔在一本诗集里看到插画，找到了他。表叔总是不慌不忙，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笑的眼睛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表叔写信劝他北上，他带着妻子和七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搬到北京，到中央美术学院当老师。一见面大家都笑了，那是北京的二月份，一对南方长大的年轻父母也对北方毫无概念，没给孩子穿袜子。他们后来笑话自己和北方的格格不入，大概是湘西人的特点。

1982年，黄永玉和沈从文一起回家乡凤凰。沈从文住在舅舅的老屋，对着山喝豆浆。两个人在吉首大学作讲座。沈从文先上台讲，他说自己毫无成就，算不得什么作家，也算不得什么考古学家，是一个“假的知识分子”，最大的天赋是“穿单衣过冬不怕冷”，什么坚强也说不上的。“我有一个习惯，我向前走了，我就不回头”。第二个讲话的是黄永玉，黄永玉摆摆手，“手艺人，不会讲”。这一年，沈从文80岁，黄永玉58岁。

还有一类喜欢讲的故事是在美院的经历。黄永玉一家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住了好长时间，这里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工宿舍，那时候，住了一院子画家，包括齐白石的两名弟子李

可染和李苦禅，还有画了《开国大典》的画家董希文。大雅宝的孩子们管他叫黄叔叔。其他爸爸教孩子写生、素描、调颜色，只有黄叔叔陪孩子们玩，斗蛐蛐，舞狮子，举着小旗子带全院二三十个孩子去动物园。

那时候聚会的还有汪曾祺，他总是一个人来家里吃饭。家里留着绳子系着的豆腐干，是给汪曾祺下酒吃的。孩子们也都知道，好吃的要等汪伯伯来了才能吃。黄永玉给汪曾祺打电话，叫他到家里吃饭，接电话的人告诉他，汪曾祺现在正被打成右派，黄永玉还是同一句，让他来家里吃饭。

往事给他一种复杂的感受，里面有很多感情，又有很多情感的淤泥。复杂的情绪淤积在一个老人身上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，喜悦、痛苦、悲伤、希望，所有情绪在同一部作品里共存。



黄永玉与沈从文

星星在黑暗之中

成就就像一棵大树似的，树形非常大，有些枝子不见得好看，但是它长成了这样大的树，别人几乎没有过。”王明明说。

黄永玉至今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作品，他没数过，也不记得。只是每天干活，创作各种各样的作品，他前半生刻木刻，上世纪七十年代画水墨，八十年代画线描，九十年代在意大利开始画油画和雕塑，回国后他做过陶瓷，画紫砂壶，与此同时，他还每年写诗、写散文、写小说。

也正因此，他有很多被人遗忘的作品。雷锋最著名的肖像是一张木刻版画，它自发表之后作为宣传被广泛转载使用，但很少人知道它的作者就是黄永玉。他最大的作品应该是毛主席纪念堂的壁画《祖国大地》。这幅绒绣壁画宽24米，高7米，但进入这里的观众很少会专门注意壁画，更难像欣赏作品一样品读创作用心。

评论黄永玉的画常见的关键词有：好玩、新奇、大胆、鲜艳，不过艺术最受欢迎的成就或许是——有钱。

黄永玉并不讨厌穷，流浪时穷得叮当响，他也过得很快乐。但

他同样喜欢挣钱，他的很多快乐也需要钱来实现，他喜欢请朋友吃饭，喜欢给妻子张梅溪买新衣服，很多新鲜玩意他也想要，他的工作室还有数不尽的新书和唱片，这些快乐都需要钱。

1990年代荣宝斋艺术总监雷振方在香港见到了黄永玉，一个将近70岁的勤奋画家。这时期他画了很多作品，最著名的作品是《山鬼》，迥异于此前的作品，用色大胆，画幅巨大。它们给人的冲击感很强，产生了一种对国画的颠覆性认识：画还可以这样画吗？

家里的小猴死了，他把小猴画在了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上，最初面值8分钱，后来成为邮票史上价格最高的作品，一度实现“一枚猴票一辆车，一版猴票一套房”。

金钱、声名、艺术、人情，在黄永玉身上是混沌的边界。这位艺术家勤奋地画画，但他也真诚地喜欢钱，喜欢大宝石，喜欢最新的跑车。活了一辈子，黄永玉只是黄永玉。这是他在《世说新语》里最喜欢的一句话：“我与周旋久，宁作我。”

(文:李斐然 图:尹夕远 来源:《人物》杂志)

“中国最后一个侠客”

黄永玉是中国最后一个侠客，这句话差一点就成真了。老家院子里有一个打拳的道场，他5岁在这里拜师学功夫，从小逃学，打过老师，打过恶霸，打过警察，上课熟读《江湖奇侠传》。12岁那年，他站在沙包架子底下做了决定——湘西汉子黄永玉，这辈子要当侠客，浪迹天涯。

然而，人生在想当侠客那天下午拐了弯。家族败落，父母失业，黄永玉跟随父亲离家，几个月后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后来投奔叔叔，中学打架退了学，他和家人失去联系，开始流浪。

现在的他是一个画家、作家、诗人、雕塑家、偶尔的菜谱创作者和长期的拳击爱好者。他平生最讨厌的一个词叫做“历史必然性”，以下两份迥然不同的人生履历都属于黄永玉：

黄永玉，湖南凤凰人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，中国画院院士，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，三次获得意大利政府官方授勋，其中包括最高等级的大十字骑士勋章。代表作包括木刻作品《春潮》《阿诗玛》、水墨画作品《墨荷》《天问》、毛主席纪念堂巨幅壁画《祖国大地》，还有很多无从归类的作品，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猴票、湘泉酒和酒鬼酒瓶的设计、电影《苦恋》的人物原型。

黄永玉，湘西流浪汉，爱好打架、逃学、偷吃爸爸做的鹤鹑脑壳，初中留级5次，因打人退学，烧过瓷器，做过棺材，在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当过老师，抗战期间在战地服务团画过海报，在香港写过电影剧本，打猎、做烟斗，60多岁在动物园门口制服了三个抢劫的小伙子。80岁时说自己还是想组织一个侠客队伍，劫富济贫，伸张正义，“比打官司解决问题好”。出生于1924年的黄永玉是

另一部中国百年史，教科书里不写的那种。他是中国最擅长打架的画家，中央美术学院唯一一个最高学历小学毕业的教授。他说自己没有学历，所以不相信书本上的历史分期，他只认两个历史时期，一个是新时代，一个是旧时代。让人平安快乐的日子叫做新时代，让人挨饿害怕的时候叫做旧时代。

黄永玉相信古老的中国道理，相信因果，重视情义，讲究礼尚往来、知恩图报，他靠具体的生活经验活着，任何后天学的理念、主义都没有大于这种质朴的人生活法则。直到今天，他骨子里依然活得像百年前的侠客，按照江湖规矩过日子，待朋友赤诚，见长辈谦卑，和三教九流交朋友，佩服有本事的，敬畏有学问的，搭救落难的，只有一种人他不来往，“害我是不行的”，这是闯江湖的底线问题。

再有两个月，黄永玉就要99岁了，该有老人模样了，可他没有。他的画室门口挂了一个拳击沙袋，写作的桌上依次摆着一支钢笔，一叠草稿纸，还有一把匕首。他每天早起画画，中午写作，下午见朋友，晚饭后窝进沙发里，抱着一只小猫，看电视上的拳击比赛。

前段时间他在准备一幅新画，一只小小的黑蜘蛛捕住了一只折翼的蝴蝶，画名《价值的判断》。黄永玉动笔前除了要准备颜料和画纸，还要解答问题：蜘蛛那么小，却可以吃掉蝴蝶，捕住麻雀，战胜远大于自己的对手，它到底是怎么赢的？

画家的答案是时间，“蜘蛛不是靠进攻战胜对手的，打是打不过的，它有耐心，等。造一张密密的网，等待猎物落网，用网束缚它，用毒针刺它，等对手耗尽力气了再去降服。”原来蜘蛛还懂《孙子兵法》呢，知道强敌是不可战胜的，胜的唯一方法是躲起来活着，等敌人自行灭亡。